唐代洛阳长安两京女性的流行服式——及其演变的内外部条件

郑 卫

流行服式是衣俗的外在表现，它承载着某一历史阶段衣俗流行过程中所体现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取向。作为一种时俗，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变化周期，诚如仲富兰先生所说：社会前进的步伐越快，时俗变化的周期越短，其更新的形式越多，内容也就越丰富。唐代洛阳、长安两京发达的科技、便利的交通、繁荣的商业，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基本条件，而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又是服式演变，时俗流行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但真正推动唐代两京女性衣俗变革的动力，还是李唐帝国与东西方的文化、经济、艺术交流。随着这种交流规模的日益扩大，两京女性传统服式在胡乐、胡舞的浸染下，与异族服式互相吸收融合，形成了不倡而行、官禁不断的衣俗[illegible]变的潮流大势。

一、唐朝的开放风气促进了两京女性着装观念的更新

我国与外部交流的历史至少可上溯到先秦时代。初盛唐时期，这种交流更是规模空前。鲁迅先生说："汉唐虽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①]李唐帝国的空前强盛与祖传的民族自信心交融在一起，展示出华夏民族的博大襟怀和宽厚包容度，由此启发了一代开放风气。

贞观末期，唐太宗革除了西突厥对唐朝的军事威胁，疏通了河西走廊至回鹘并由此延伸到婆罗门、大食、波斯、亚梅[②]等国的文化商旅通道——丝绸之路，大批胡商沿着这条古道云集洛阳、长安两京，朝廷也在两京设立鸿胪寺、四方馆等具有中央权威的专职贸易机构，"以领四方蕃客"。

当时在两京行商的胡人达数千之众，他们有的贩运丝绸织绣、珠宝文物，有的开设香行酒肆，有的以立祠传教为幌子做着投机商人的勾当，如婆罗门僧惠范就"殖贷江剑"，其家财"居数十万贯"。[③]随着商贸范围的扩大和发展，各种域外艺术也通过各种交流媒介进入两京，胡乐、胡舞、杂技等是域外艺术的代表。唐太子李承乾居东宫时，"使户奴数十百人习音声，学胡人椎髻，剪彩为舞衣，寻橦跳剑，鼓鼙声通昼夜不绝"，李承乾"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毡舍，建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使诸'部'敛羊以烹，承乾身作可汗死，使众号[illegible]面，奔马环临之"。[④]宫中有所好，世人有所染，宫廷及上流社会中人的所好对朝野的尚胡风气的形成有很大的带头作用。太平公主夫武延秀曾出使胡地，归朝后学胡语、歌胡曲、舞胡旋以为戏乐。此类尚胡风气，直接影响并助长了宫人和皇亲国戚阶层的开放意识，并波及市井，对两京女性服装的开放风气的形成，起到了催化上扬的助澜作用。应当承认这在中国封建时代是十分可贵的

风尚，体现了社会进步和汉民族百川汇流的博大襟怀。

《旧唐书·舆服志》载："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着[illegible]，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illegible]原为西域部族的一种服饰，北朝后期传入中原，隋代宫中"多参戎狄"之制即含此式，它是后世披风的滥觞，唐初作为宫女、王公女婢的一种常服。虽然[illegible]为少数民族之服，但它"全身障蔽"的衣制却与华夏族的传统观念暗合。贞观末至永徽初，宫人始着一种垂网至胸、貌似斗篷的帷帽，虽然也是泊来之物，但"若隐若现垂网中"的女性已于无声处向"全身障蔽"的观念发起了挑战。"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至颈，渐为浅露，寻下敕禁断。初虽渐息，旋又仍旧。"⑤因为帷帽盛行，且帽裙浅露，禁而不止，朝廷认为"不依格令"有伤教化，故唐高宗于咸亨二年下敕："百官家口，咸预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著帷帽，遂弃[illegible]。会不乘车，别作檐子，递相伤效，浸成风俗，过为轻率，深失礼容。前者已令渐改，如闻犹未止息。"⑥唐高宗对两京士女服式开放已"浸成风俗"的事实，虽责为"过为轻率，深失礼容"，但因"递相仿效"的传统观念无从拘束，所以表示出难以止息的无奈。

"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着丈夫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⑦宫女衣衲衫，少妇著丈夫鞋衫，是唐代女着男装时俗的表现形式，他们把传统的右衽广袖交领袍翻然改制为窄袖，束腰的圆领式，头束男性"平头小样巾"或"武家诸王样"巾⑧，轻便的锦靴、线鞋替代了笨重的高头履。有的士女头戴胡帽，身穿圆领束腰袍服，脚着高丽"乌皮六合靴"，这种将东西方靴帽与中国传统服式杂揉一身的装束，从观念上讲，为两京女性衣胡服和服式的多元化提供了积极的审美过渡；从衣制上讲，它又是改制后有保留的符合审美要求的生活便装，是介于中国传统服式与胡服之间的过渡性装束。

服装是思想的表征。从"全身障蔽"的[illegible]到"拖裙至颈"的帷帽，两京女性服式上的开放之风已初见端睨；从"靓妆露面"到"露髻驰骋"，宫闱和王公之家女性不仅是开放风气的先行者，也是服式观念更新的推动者；从"女着男装"到"女衣胡服"及盛唐服式多元化态势的形成，两京女性最终完成了衣俗[illegible]变过程，开放性的流行时俗已成为官禁不断的潮流大势。这种开放不拘的衣俗是在与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氛围中形成的，其之所以能够风靡初唐、盛唐、中唐三个历史阶段，除了社交、生活、优游等方面的便利外，还为两京不同阶层女性提供了服式上的新奇和美感。

二、胡乐胡舞的浸染与两京女性服式的胡化

李唐王朝开放风气的形成，离不开东西方经济、文化窗口的对流，异族他邦的风俗内容随着各种交流媒介渗透进皇室、中产阶层和庶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胡乐、胡舞、胡服对两京的浸染最广泛、最深远。

武则天时期，经济发展，国力增强，鼓舞斗志的传统劲舞已不再为统治者所重，龟兹、西凉、高昌等少数民族乐舞与传统乐舞互相借鉴、吸收、融合，成为新型的宫廷乐舞。延载元年（694年），"太常乐立部伎、坐部伎依点鼓舞，间以胡夷之伎"。⑨胡伎入宫献技最初仅是助兴表演，最早在宫城大衢表演的"胡舞"是来自天竺的"泼寒胡戏"，也称"乞寒泼胡"。武则天临朝在洛阳端门城楼下大陈百戏，其中就有泼寒胡戏。开元初，泼寒胡戏被禁止，代之而起的是域外的"胡腾"、"柘枝"、"胡旋"等舞，这股强劲的域外之风席卷了两京各个角落，"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王建），这说明不仅"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从宫廷到里巷竟相"尚胡"，此风之盛，前所未有。浓厚的尚胡氛围，为胡伎、胡婢提供适宜的流寓环境，而王公官史、富贾文人也以家蓄胡伎为荣，一些遗老勋将也以此举为风雅。每当夜幕降临，高门广第便"丝竹并奏"，听胡伎之歌，观"团转"之舞，为了夸异炫奇，还"重门洞开"，听任"比邻之家"、"里巷匹庶"观赏。除了胡伎和胡族婢女之外，在两京行商的胡人也使出了"胡姬"招徕生意的招数。不论是从事歌舞的胡伎，还是当垆的胡姬，还是被役使的婢女，都保留着本民族的惯常服装，于不自觉之中充当了胡服模特。"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元稹），可见，两京闺媛少妇竟著胡服的流行时俗与胡族歌舞伎服式的直接浸染是分不开的，"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者也"。⑩

"胡服"是中原人对西域民族服装的泛指，它是由帽、衫、裙（或裤）、靴构成的并附有佩巾、佩刀等饰物的世俗化套装。西安、洛阳唐墓出土的壁画、陶俑不仅佐证了正史、稗乘关于女衣胡服的记载，也印证了唐诗中有关胡服形制的描述。"织成蕃帽虚顶尖"，指得是一种织成的卷檐尖顶胡帽，有红檐蓝帽、绿檐蓝帽、绿檐红帽，这原是男性胡族的生活帽式，开元之后，两京女性对此帽的檐、顶身的颜色进行间色，并附有插花装饰，使之更符合女性的审美要求。无檐胡帽是更为普及的帽式，它也来自胡舞。"未著柘枝花帽子"，"帽转金铃雪面[illegible]"，可见这种无檐花帽来自柘枝舞，并饰有金铃。还有一种饰有珠玉的胡帽，当时称之为"珠帽"。上述胡帽是两京女性帽制的主要形式。

胡衫是一种圆领或桃形领窄袖上衣，舞衣袖长，生活装袖短，白、红、兰、绿、紫色居多。舞时配裙，生活装多配裤，上下衣色调搭配颇富中国传统意味：白衫多配红裙、兰裙、绿裙，或红绿相间、红白相间的条纹小口裤；绿衫配红裙、白裙或红白相间，兰白相间的条纹小口裤；兰紫色衫多以红白间色。胡服颜色的搭配也透出两京女性爱美的传统心态。

胡靴有皮质和棉质之分。皮质有高筒尖头靴和半

高筒尖头靴，多为牛羊皮质。锦靴有绣花尖头锦靴，有云头锦靴。天宝末又大量出现云头锦鞋和绣花线鞋，虽然高宗、武后时期也有这种鞋式，但仅为上流社会女性着穿，天宝末已成为普及鞋式，这使得胡服逐步与传统合拍，更生活化。

沈括《梦溪笔谈》中说："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仍全用胡服。"北齐以来，北方诸朝官服参有夷族服式是事实，但不是主流，对下层民众的服装观念没有什么影响。况隋代之前战火兵燹，经济不振，人民处于乱世，能够苟全性命足以额首庆幸，何敢奢望服式之美！开元之际，政治上祥和安定，生活上颇为富足，人们追求衣食之美则在情理之中。经济基础的雄厚，商业市场的繁荣，为社会提供着日益丰富的消费物品，也为社会成员提供了更大的选择余地，当然，也促动着新观念的萌发。而观念的更新又推动着时俗演变和流播。胡服从最初的进入宫廷，到两京女性的"全盘西化"，虽然有一个当然的渐进过程，但在政治开明、物质丰富的条件下形成的开放风气中，便于生活、交往而又富有奇异美感的胡服得到两京女性的青睐，则是胡服风靡两京的必然结果。

三、女性服式的薄露透和衣裙花色的多元化

开元时期的升平景象主要体现在政治开明、社会安定和经济的长足发展方面。经济的繁荣为纺织业注入了活力，棉织、丝织、麻织、毛织等纺织品类行业获得空前发展，充实并丰富了全国的商业市场。长安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西域商贸交流的轴心。洛阳是输送长安并辐射全国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吞吐四方商货，完善商品流程，是全国的商贸总署。得天独厚的商贸地位使得两京商业繁荣、市肆连甍，不仅有六大官办商业市场，还有遍布街坊里巷的私营帛铺和织染作坊，仅洛阳南市"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长安东市有肆数千家。这些官办商业市场和私营铺肆为不同阶层人士提供了更多的消费选择，尤其为两京女性提供了充足的衣料和绚丽的花色。

为了迎合两京女性的消费心理，各种衣料则更加注重季节性和表现效果。衣料的薄和透是两京女性开放观念的新走向。"身轻裙薄易生力"、"忆得双纹衫子薄"等诗句道出了京城士女衣衫质地和实用功能。"绮罗纤缕现肌肤"、"绶带盘金缕，轻裙透碧罗"，这种"薄罗衫子薄罗裙"不仅是薄如蝉翼的纳凉夏装，还是女性炫耀春肌和胴体线条的借物。这种衣裙本身就是对传统"障蔽"观念的悖逆，与"靓妆露面"的大胆相比，又向女性表现自我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逐步成熟的开放意识为新时俗的递变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天宝时期，两京兴起"袒胸裙"热。袒胸裙有方领式袒胸、圆领式袒胸和双桃领式袒胸；有白、绿、紫、淡绿、红诸色。此袒胸衫式自宫中兴起，原为西域少数民族的舞衣，电视剧《唐明皇》中杨玉环所著袒胸之式并非虚构。宫中舞女、王公家婢的影响促动了更多女性的着穿，应该说是舞女带动了袒胸之风。从"薄罗衫子掩酥胸"，到"粉胸半掩凝晴雪"，再到"半束罗裙半酥胸"，女性摆脱了传统禁忌，崇尚体态丰满，放胆追求形体表现和服式美感，在薄透衣衫还不能尽情施放表现欲望时，又推出袒透衣衫，展示自己裸露得体的肌肤之美，这是两京女性对传统观念屏障的勇敢跨越。事隔千年，这种袒胸装束又出现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不仅丰姿优雅的年轻女性宠爱，即便是丰韵犹存的"半老徐娘"也成了它的知音。时俗流行，古今亦然。

与袒胸裙同时风行的还有一种流行最普遍、最为中下层女性所青睐的生活套裙，既要讲究衣料质地，又强调衫与裙的花色搭配，是最有流行价值的时装。

此种套裙在唐墓出土的壁画、唐歌舞俑、士女俑可与唐人诗句互证："翡翠黄金镂，绣成歌舞衣"，"吹箫饮酒醉，结绶金丝裙"，"轻罗金缕花葱笼"、"宝钿香娥翡翠裙"，这是金线作绣，结缀翡翠的衫裙。"藉丝衫子柳花裙"、"黄罗衫子黄泥裙"、"肉丝衫子石榴裙"、"紫罗衫子郁金裙"⑪、"黄裙"、"簇蝶裙"、"隐花裙"等，属于织锦、提花、印染裙衫，有六破、十二破⑫，裙式之多，花色之繁，非前代可比。从大量唐墓壁画中可以了解到这种裙式，并成了唐代广为流行的衣裙形式。穿着这类套裙再配以或黄、或紫、或蓝、或红披帛，真是莲步百媚，妖娆万种。

两京女性的裙式不仅是流行时俗的载体，也是她追求美、表现自我心态的体现，它与今日"吃饭讲营养，衣服讲漂亮"的生活之道不拍即合，可谓是同源不同流，异代而同风。

文明的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服装，往往融和谐、美观、悦目和实惠于一体，赢得了社会成员的心理认同方得以流行。唐代两京女性服式衍变的主观因素是服装观念的更新，不同时期的衣式以其新颖和美感，点燃了女性的爱美渴望，唤起了她们对美的更高层次的追求。正是这种追求，才有了服式上的艺术创新，才塑造了唐代女性个性化的美好社会形象。两京女性服式的变革和时俗的流行，不是人为的力量推行的，也不是人为的约束可以制止的。连至高无上的皇权也奈何不得，足见时俗的力量之大、辐射之广、浸染之深、流行之劲。

注：

①鲁迅《坟·看镜有感》

②分别指印度、阿拉伯、伊朗、阿曼

③张鹭《朝野佥载》

④《新唐书·常山王传》

⑤⑥⑦⑧《旧唐书·舆服志》

⑨《旧唐书·音乐志》

⑩《隋书·音乐志》

⑪文中所引诗句未注出者，均引自《全唐诗》

⑫破即幅，"六"、"十二"裙幅之谓也